



重庆出版社
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ZHONGGUO
ZHENGZHI TIZHI
GAIGE DE
XINSHENG

中国政治 体制改革的心声

高放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ZHONGGUO
ZHENGZHI TIZHI
GAIGE DE
XINSHENG



中国政治 体制改革的心声

高 放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 / 高放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4

ISBN 7-5366-7695-6

I. 中... II. 高... III.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4487 号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

ZHONGGUO ZHENGZHI TIZHI GAIGE DE XINSHENG

高 放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周世慧

责任编辑: 周世慧

责任校对: 娄亚杰

装帧设计: 吴庆渝 曹 颖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图文制作部制版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书林图书发行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3.5 字数: 359 千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书林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重庆出版社科学学术著作 出版基金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钱伟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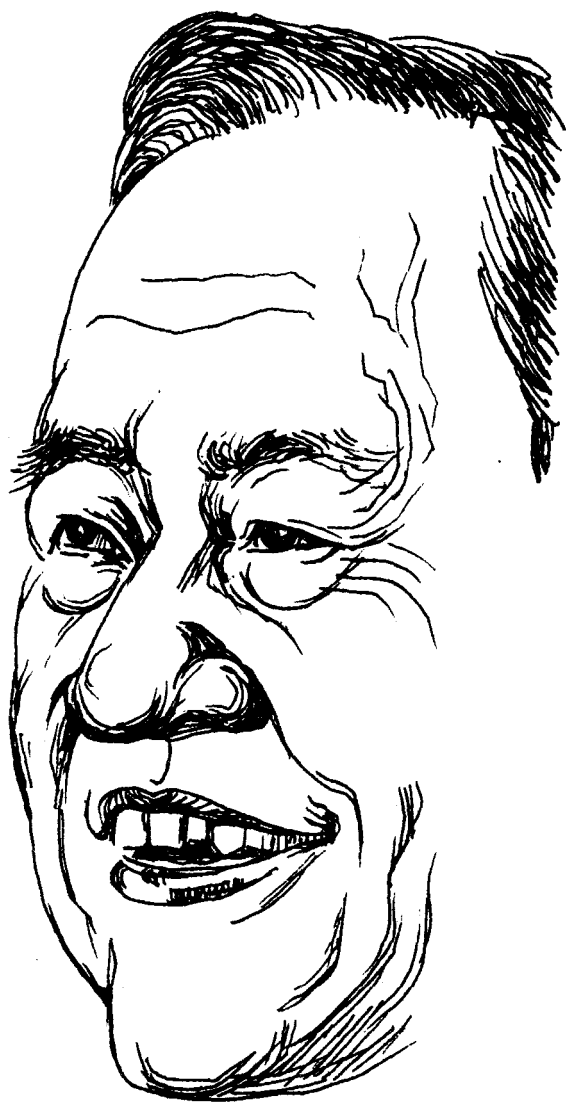
副主任委员：蒋树声 伍 杰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石孙	于光远	马 洪	王梓坤
卢 云	卢 强	白春礼	冯之浚
伍 杰	任继愈	刘 杲	刘东生
汝 信	李重庵	李振声	邱式邦
宋叔和	张梅颖	陈 竺	陈 颢
罗涵先	季羨林	周光召	郎景和
胡亚东	饶子和	钱伟长	徐崇温
黄长著	蒋树声	程理嘉	瞿林东

逝世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卢鸣谷 刘大年 张致一 费孝通



小丁 2004.

感谢米寿高龄的著名漫画家丁聪先生为我画像。我同他已是老相识了。1946年10月21日我到上海万国公墓鲁迅先生墓前参加鲁迅逝世十周年祭礼时同他初次见面。他同文化界名人郭沫若、茅盾、田汉、胡风等都是我带去的一本《鲁迅语录》封面上签名留念。后来我在北大的同班同学同乡沈峻女士成为他的夫人。

自序：一个老教授 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

一、从 1979 年起我接连不断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1946 年我毕业于福州英华中学后，考进北京大学，积极参加学生民主运动和地下党领导的民主青年同盟的活动。1948 年 1 月越过国民党政府的封锁线，奔向解放区。本想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没有料到，我竟被送到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文法学院学习；8 月间北方大学与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我又被吸收为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研究生，在著名学者何干之教授指导下攻读马列主义基本原著。1949 年 3 月我随华北大学的队伍从河北正定县迁进刚解放的北京城，提前结束了研究生学习生活，担任学习助理员，开始从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教育工作。也在这一年年底，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 年 3 月，中央人民政府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创办新中国第一所新型的文科综合性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从此我就一直在这里执教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从教员、讲师、副教授到教授，主要是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我也深受“左”的路线、个人崇拜（即个人迷信）和个人集权制的毒害。1978 年底我们党端正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之后，痛定思痛，我深感我们党在二十多年之中长期犯“左”的错误难以纠正，根子在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有严重弊病。

1979 年，我提交中国人民大学纪念“五四”运动 60 周年全校科学讨论会的论文，题为《反对个人迷信是国际共运史的优良传统》。文中指出：“个人迷信的意识形态是和个人专制的政治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个人

迷信的意识形态是个人专制的理论根据和思想基础。反之,个人专制的政治制度又是个人迷信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民主是根除个人迷信的消毒剂。如果缺乏充分的民主,就会导致个人集权过多。”“只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才能从制度上保证巩固我们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防止把社会主义制度蜕变为社会法西斯主义或封建社会主义。”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初我写的这一篇论文,发表于《世界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1979年第4期,全文收入《新华月报》(文摘版)1979年第10期^①。全文主题虽然是论述反对个人迷信问题,但是已经标明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反对“个人专制的政治制度”,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恢复和发挥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即是说,我在1979年5月开始提出我国的政治制度改革问题。

到1980年,我进而探究我国政治制度的主要弊端,并且提出具体改革方案。这一年10月6日我应《光明日报》编辑部邀请,在首都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题为《重新总结历史经验,大力推进政治改革》的讲话,摘登于该报10月17日,收入《新华月报》(文摘版)第12期。同年10月7日我提交中国人民大学30周年校庆科学讨论会的论文题为《社会主义国家政体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民主共和制政体理应是权力制约制、权力任期制和权力选举制,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带头实行的个人集权制、领袖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这“三制”背离民主共和制,必须进行改革,其核心是要妥善解决党政关系问题,实行党政分开;同时,我还对如何改进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出十点建议。该文后来分为《民主共和体制是什么样》和《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刍议》两篇分别公开发表,现均已收入本书。在整个80年代,我曾经就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尤其是就如何发展共产党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多党合作的党际民主等问题,发表过30多篇文稿,多次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接连不断呼唤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1985年11月23日,我应邀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参加中央领导人布置的如何改进党的建设问题座谈会。我在会上提出按照马列

^① 此文另收入高放文集之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74—588页。

主义党建理论,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中央委员会是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而我党党章从1922年起历来把党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委员会并列为党的最高机关,这样写法是不合适的;与此相联系,“全党服从中央”的提法应该改为全党服从党代表大会,党的地方组织和部门组织服从中央(如军队、工会、妇联、青年团中的党组织)。1986年11月26日,我又应邀到中央直属机关招待所参加了中央另一位领导人布置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座谈会。我再次提出以上以及其他有关建议。先后都得到党中央两位领导人的肯定,他们都说以后修改党章要考虑我的意见,采纳我的建议。

1986—1987年,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再次提出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7年10月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决定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的日程,并且要从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等七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当时全党全国人民无不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为了配合党代表大会的重大决策,1988年7月成立了半官方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由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杰同志任会长,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同志任名誉会长。杜润生、钱其琛、尉健行等23个部长级高级干部担任顾问。领导上曾派人找我谈话,要我担任副会长。我当即表示,副会长理应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担任。可是中央领导人认为我发表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既符合马列主义原理又切合中国实际情况,所以还是挑选我作为学者的代表就任副会长。7月12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成立大会,薄一波同志亲自到会,并且作了重要讲话。周杰会长在会上提出研究会三项任务:介绍国内外各种有关资料,向中央和地方领导提出各种建议,进行理论与宣传。研究会成立后几次理事会都在中南海中央办公厅召开,由周杰会长主持会议。我们组织出版了一套由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政治体制研究丛书》,1989年初创办了会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还举办过讲习班,开展了与外国的交流。本来已决定1989年秋后由我担任团长,组成一个代表团到日本考察访问。可是这一年发生了政治风波之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被迫停止活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事业也进入了步履维艰的阶段。

二、1989年以来我持续不懈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作为一名勇于独立思考、勤于深入钻研的老教授、老学者,我

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取得全面成功的头等重要大事。所以近十多年来我依然不减 1979 年以来愈益增长的锐气,不畏“左”的势力屡次对我进行种种打击,在讲坛上文坛上反复不停总结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的深层根源,持续不懈呼唤加快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1989—1992 年东欧各国和苏联发生的剧变更使我深刻反思。不少人认为苏联东欧各国社会主义的失败是由于这些国家党的领导推行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转去照搬西方三权分立、多党平等竞争的政治体制而造成的。我以为这只是表层的观察。实际上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几乎普遍照搬苏联模式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长期推行一党专政制、以党代政制、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官僚特权制等等,缺少社会主义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拒不进行体制内的改革,引起越来越多党内外人民群众的不满,结果这种政治体制终于被人民群众所抛弃。这些国家的党政领导人大多是在党内外、国内外多种压力威逼之下,被迫转去推行体制外的改革,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和多党竞争制,结果执政的共产党纷纷落马,社会制度发生剧变。物极必反,这是事物发展的常理。实践证明,长期的“左”势必助长后期的右,右是对“左”的惩罚和反动。也有个别党一“左”到底,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制、个人集权制和严密的思想控制等等,拒不听取群众正确意见,结果失败得更加悲惨。如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兼共和国总统、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和爱国卫队总司令尼·齐奥塞斯库,在 1989 年 12 月底当人民群众上街奋起表达自己的意愿时,他竟下令爱国卫队(即武警部队)开枪镇压群众,引起部队哗变,齐奥塞斯库夫妇当即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立刻处决。罗共覆灭之后,罗马尼亚最终也转向西方那种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政治体制。苏联东欧剧变的经验教训主要是:执政的共产党如果不能自觉地进行体制内的政治改革,不论先“左”后右或者一“左”到底,结果都必然是转向进行体制外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代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来势迅猛,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铁律。专制已无藏身余地,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理应优于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不容掺杂封建专制主义余毒,而要彻底清除苏联模式极权政治的这些毒素,饱吸中外古今各种政治文明精华,进而开创更高形态的民主。执政的共产党如果不能消除专制、开创

更高形态的社会主义民主，那么人民大众最终只好被迫无奈去接受资本主义民主。固守专制、极权的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终究是会被资本主义民主的巨浪冲垮的。

邓小平理论在国内问题方面最重大的贡献有两条：一条是改革苏联模式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另一条是改革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深知：我们“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①，而且“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②；这种政治体制的弊病是“权力过分集中”，“容易造成个人专断”^③；因此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④。邓小平于1986年强调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党和政府的关系。”“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⑥我认为邓小平这些至理名言至关重要，一定要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针，不论遇到任何风浪险阻，迟早我们都要尽力付诸实践。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我国经济继续得到发展，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决定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我国经济增长显著加快。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未能同步进行，以致党政官员的腐败超过80年代中后期，出现一轮又一轮的加剧现象。当前腐败正如有的专家所指出的，已呈现普遍化、团伙化、大额化、高层化、制度化的趋势。党政机关中机构臃肿、任人唯亲、滥用权力、官员特权等恶习依旧严重。要根治腐败等积弊，不能只靠治标，还必须治本，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因此，我在总结我国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1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1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177页。

1949年以来政治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1989年至2005年又持续不懈就如何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发表了40多篇文稿,在社会上有较为广泛的影响。

三、编纂本书的缘由、原则和目的

1999年底,我自编了一本名为《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文集,约70多万字,联系好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出版社审稿后感到当时国内社会环境欠好,“左”的势力又抬头,还顾及大部头的厚书市场不便营销,所以要求我删去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部内容,只保留有关政治学方面的19万字,先出一个精选本。由出版社取名《高放政治学论萃》,于2001年9月出版,印数3000册,迅即脱销。

到2002年,形势大有好转。我新编了三大本文集,当即由直属新闻出版总署的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其中一本书名为《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①,只印了1500册。面市后很快就售完,很多读者通过多种渠道向我反映要这本书。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现在我从精选28篇,另加上14篇(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近三年新写的),合计42篇,重新编纂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一书,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全书分为五编,以逻辑关系为主、时间顺序为辅进行编排。第一编,政治体制改革总论,主要论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密切关系,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及其重要性、先行性、曲折性和紧迫性。第二编,民主、法治和政治文明,说明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两大原则,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曲折历程和重大意义,政治文明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指针和目标。第三编、第四编、第五编,分述社会主义民主的三大组成部分,即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党际民主。党的十三大报告早已提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②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党际民主,我认为这是摆脱苏联东欧一党专政制模

① 我把改革开放以来发表的文稿,分门别类自编出版了五卷本文集,分卷书名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998年又出增订本)、《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纵览世界风云》(后三本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这五卷文集,总共344万字。我还计划选编第六卷文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第七卷文集《治学风雨路漫漫》。

②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51页。

式、开创新型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模式的关键所在。

我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各个问题上提出的新论点、作出的新论断，从各篇文稿的标题，尤其是副标题和二级标题中，大体上可以一目了然，这里勿庸赘述。至于这些新论点、新论断及其具体论述和提供的论据，只有恭请读者评论指正了。在全书各篇中，我认为以下五篇文章最有代表性，即第一编中《十六大的新成就以及给党中央新领导班子的两条建议》，第二编中《切实掌握共产党执政的三大法宝》，第三编中《党内民主是民主执政的首要关键——对修改现行中共党章的十点建议》，第四编中《对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长期思考——50年忧乐回忆》，第五编中《再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关于社会主义多党制之新见》。各篇文章编入本书时，根据各编主题，大小标题有的作了修改，但是内容都保留原样，以如实反映一个学者当时的认识。有的文章在报刊发表时因篇幅有限或编者认为不合时宜被删改，凡保留有原稿的照原稿排印。由于本书是文集，难免有些问题有重复之处；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一再重视、强调哪些问题。有的文章收入本书时删节了与本书主题关系不大的部分。有一篇只在内部刊物上刊登过，其余全是公开发表的（篇前都已注明报刊名称与发表时间）。在内部刊物上刊登过的这一篇文章，谈论的是重大问题：《对海峡两岸关系和“一国两制”问题的新思路》，文中提出的新思路主要是两岸关系要采取五句话十五个字的方针，即“热为好，和为贵，通为先，谈为上，统为终”。近年来两岸人士的热烈交往与频频释放的和平善意，印证了我的设想，但愿两岸将来能够以“国中有国”的“一国两制”的新模式实现统一。我的这个新建议未必适当，可供参考和讨论，并请赐正。

我之所以要编纂出版本书，是想把我近25年来陆续论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稿精选汇总于一册，便于读者倾听一个老教授、老学者声嘶力竭、长久呼唤、高声呐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希望借此能够唤起众多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人民大众，增进共识，共同奋起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时常想起宋朝诗人王令（1032—1059）在七绝《送春》中留下的千古绝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古代传说子规，即杜鹃鸟啼叫最苦时会啼血。清末诗人黄遵宪（1848—1905）在《赠梁任父同年》中还有肺腑之言：“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但愿我呕心沥血、忧思含泪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会得到东风的回响。

四、学者的呼声得到社会的反响,期盼东风劲吹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已经得到社会的反响。近几年来在书刊和网页上已能看到社会上有人肯定我的研究成果,表明赞同甚至引用我的某些观点。例如,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的《南风窗》(广州)半月刊,2003年2月下旬这一期发表拙文《给党中央新领导班子的两条建议》时加上了一段编者按,其中这样写道:“这位1949年10月1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学者,多年来在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的研究方面倾注了巨大心血,成就斐然。”《南方周末》2004年2月12日发表的该报记者的一篇述评中写道:“在四壁都是资料书籍的家里,国际共运史权威专家高放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这位76岁的老人从1980年开始,无论走到哪里都强调健全党内民主的关键是发挥党的代表大会的作用。”求是杂志社主办的《红旗文稿》2003年第22期刊登中共长沙市委党校徐少兵同志的文章,文中五次提到我对党内民主问题的研究成果,认为我就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思想观点”。“高放教授的这些研究成果,吸引了一些学者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最近在《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4期(7月24日出版)刊登的厦门市委党校基础部主任尹彦教授撰写的一篇书评的结尾中竟有这样的评语:“像高放先生这样系统、深入、大量,而且是独立地研究政党问题的,在中国是难找第二人了。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摆脱教条主义与极左束缚,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结中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二三百年来政党历史实践的经验教训,见人之未见,言人之未言,由古及今,由社及资,由外及中,条分缕析,鞭辟入里,发人深思,它是无数仁人志士与芸芸众生的鲜血浇灌出来的结晶,它对于今天我党的建设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样对我的过高评价实有溢美过奖之处,然而他认为我的研究成果对我们党的建设有现实意义,却是真心实意的感言。同时,不久前我还接到大连市一位素昧平生的退休干部给我寄来一封挂号信,他读到报刊上我的一篇文章后对我表示:“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没有感受到有多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不能只在领导层和学者之中议论,还必须吸收广大干部和群众参与,这样才能收到实效。”

近日又接到西安某研究室署名“两位热血老公民”2005年12月23日寄给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和我的一封信,纪宝成校长阅后转

给我。全信不长，言词恳切，不妨引述如下：“纪宝成、高放二位先生：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最伟大的革命，它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二十多年来，十三亿人民大众都在焦急地期盼着。对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对基层官员的严重腐败且欺压群众，都表示特大的忧心和愤慨！”“你们都是国内有良知的著名学者，有人大代表，有政协委员，实际上都是国家的高层官员，你们都有很多‘民主’空间，但你们绝不能忘记国歌，绝不能忘记宪法，绝不能忘记人民赋予你们的崇高天职！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任仲夷等同志那样，能多一些呼出民众的声音，多发挥你们的智慧，为促进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做出新的贡献！祝你们这些社会脊梁身体健康！”“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喊了二十多年，只见雷声，不见下雨，而且旧的体制好像越来越巩固。改革的困难和阻力在哪里？十三亿人民都在苦苦地期待，现在是党中央下决心的时候了。”

我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纪宝成校长确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既非人大代表，又非政协委员。我不是庙堂伟器，只是民间学者，平民教授。不过从这封热切期盼政治体制改革的群众来信可以看出，我一再发出的加快加大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的激越吼声，确实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心声。我既是从人民大众的权益和福祉慷慨长歌呼与鼓，我想必定会在人民大众和执政为民的领导人中赢得众多知音和知心。看来当前中国可以说是万事皆备，只欠强劲的东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真是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如果一再延误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功亏一篑，重蹈苏联东欧覆辙。这并非危言耸听，妖言惑众，而是盛世危言，逆耳忠言。但愿“众心成城，众口铄金”（语见《国语·周语下》），上下互动，同心协力，冲破难关，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迈出新大步。

衷心感谢重庆出版社为我出版本书，感谢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任汝芬教授等人的帮助。书中的欠缺和差错，恳请专家、读者指教。

高 放

2005 年国庆节于中国人民大学寓所顶斋

12 月底修订补充

目 录

自序：一个老教授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	(1)
---------------------------	-----

第一编 政治体制改革总论

政治体制改革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3)
一、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关系	(3)
二、现有政治体制的弊病及其危害和根源 ...	(6)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正确处理集权 和分权的关系	(8)
政治权力结构合理化的十个问题	(13)
一、党内权力结构	(14)
二、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	(16)
三、党政分开	(18)
四、政权机关内部的权力结构	(21)
五、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合理结构	(23)
六、党、政与经济单位的权力结构	(24)
七、党、政与文化单位的权力结构	(25)
八、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团体的权力结构 ...	(26)
九、干部的权力	(28)
十、人民群众的权力	(30)
改革的热点、焦点、难点在于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1989年《未定稿》记者访谈录	(34)
一、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要先行	(34)
二、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两进两退	(34)
三、决不能以新权威主义为旧体制作理论 辩护	(37)

中国改革应政治先行

——香港《文汇报》特稿 (39)

一、国营经济要搞活,私营经济要发展 (39)

二、物价改革需要充分讨论 (40)

三、十年后预料会有大发展 (40)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迈出三大步 (41)

一、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三大步,政治体制改革只迈出

三小步 (41)

二、政治体制改革应怎样加快迈出三大步 (44)

勇闯窄门,还是照走大路

——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 (54)

一、对十五大提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任务背景的认识 (54)

二、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 (56)

三、关于机构改革问题 (57)

四、关于苏联东欧剧变的前车之鉴 (58)

五、关于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年会制”和“常任制”的倡议 (59)

六、关于发展党际民主,提高民主党派地位和作用的倡议 (62)

七、关于发展人民民主,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倡议 (63)

十六大的新成就以及给党中央新领导班子的两条建议

——答《南方窗》记者问 (66)

一、十六大为恢复国际共运的民主传统树立了良好实例 (66)

二、完整、准确理解马列主义 (68)

三、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70)

四、政治体制改革成功才能根治腐败 (70)

应对全球化新浪潮,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73)

一、世界全球化、民主化三次浪潮的警示 (73)

二、对中国政治体制要坚持三分法,不搞一点论 (75)

三、清除封建主义糟粕,加快发展党内民主 (77)

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优选之路” ——评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路》	(80)
--	------

第二编 民主、法治与政治文明

重新总结历史经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85)
一、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创举没有解决好 四个问题	(85)
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就巨大,政治制度弊病严重 ...	(86)
三、我国历经弯路,要大力完善社会主义民主	(87)
什么是民主共和政体	(88)
一、民主共和政体应该是权力制约制、民主选举制、 限制任期制	(88)
二、苏联带头实行的领袖终身制、个人集权制、指定 接班人制背离民主共和制	(88)
三、核心问题是妥善解决党政关系问题	(97)
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1987年答《改革与理论》杂志问	(101)
一、为什么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101)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建设有哪些特点	(103)
三、当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注意哪些问题	(104)
四、怎样看待政治公开化问题	(106)
二十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制度建设	(107)
一、1978年前后中国政治体制的重大变化	(107)
二、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制度建设刻不容缓, 时不我待	(115)
我国当前急需民主和科学,还要商品经济和法治	(125)
依靠民主与法治,才能根治腐败	(128)
一、民主是法治的前提,法治是民主的准则	(128)
二、当前最紧迫的是要制订三种法	(130)
只有用民主促进法制,才能实现法治	
——1993年《深圳法制报》记者访谈录	(132)
民主是法治的基础和保证	(134)
切实掌握共产党执政的三大法宝	